

李 杰◎著

历史进程 与历史理性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

LISHI JINCHENG YU LISHI LIXING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历史进程 与历史理性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

LISHI JINCHENG YU LISHI LIXING

李 杰◎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李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01-008731-3

I. 历… II. 李… III.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IV. B0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807 号

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

LISHI JINCHENG YU LISHI LIXING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

李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26 千字

ISBN 978-7-01-008731-3 定价:2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言

历史学是否需要理论？这是一个在历史学领域里曾经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历史学界，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喊出了“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的口号，而年鉴学派史学则提出了“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这一与之对立的主张。在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史”、“论”关系，也展开了较长的争论，有所谓“论从史出”、“以论代史”和“史论结合”三种主要说法。回顾 20 世纪我国史学发展历程，历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呼唤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并推动着史学理论的发展。上个世纪初叶，李大钊等一批先驱围绕史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史学界曾经围绕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起义与战争、汉民族形成、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争鸣。认真审视这些问题的讨论，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在每个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都从最初对史料和史实的不同解释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不同理解上。这些问题的争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反映，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适应改革开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史学界逐渐重视并

不断大力吸收国外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这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使我国的历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时至今日，已没有人可以否认史学理论的重要性。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进步应该是史学理论确立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就是，它既属于历史学，又高于历史学。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的发展先是经历了50、60年代的重视有加和“文革”中的无限拔高，又经历了80年代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冷遇，有人称之为“史学危机”。经历这一正一反两个阶段的洗礼，现阶段，我国史学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快步发展。健康、快速发展的中国史学，正呼唤着史学理论的发展。

因此，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的研究，加强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拙见以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理论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他在科学研究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同理，一个学科理论水平的高度，同样决定着这个学科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换言之，没有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新时期的历史科学要达到新的高度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史学理论学科的重要性。每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论是研究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也不论是研究历史学的什么领域，都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史学理论问题。

历史学是云南大学重要的优势学科，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一直受到重视。早在20世纪40年代，杨坤撰写了中国早期史学理论专著《葛兰西研究导论》。50年代李埏等一批教师积极参与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学术讨论。80年代谢本书等受教育部委托，与山东大学历史系合编了建国后第一部高校通用的《历史科学概论》。熊锡元撰写了《民族特征论文集》，马忠民、罗秉英等编辑了《中国古代史论

选》。90年代文思启主编了《史学概论》，李杰撰写了《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论争》，刘鸿武撰写了《人文科学概念》，韩杰等参加编写了《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等。一些论文在国内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如《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论》、《民族心理与民族素质》、《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人文科学与史学功能》。云南大学历史系还和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了第九届、第十二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基于以上认识，在这一思考的过程中，我和李杰教授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形势的需要，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切实建设好云南大学的史学理论学科。李杰教授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曾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该书就是他的研究的一个部分。几年前，在我们第一次讨论后曾拟出了一个云南大学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研究计划，李杰教授愿意将他的这本书作为研究计划中的一项成果予以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是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个新开始。

在本书中，作者站在历史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围绕如何将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论科学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这一核心问题，对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问题及方法论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梳理了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以便回答唯物史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唯物史观的时代性、科学性究竟何在的问题。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简单地排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历史哲学就止步，而是对各种历史哲学产生的思维逻辑和认识论价值进行了分析，这样就使本来是一般的历史过程的叙述带上了认识论的分析，对于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论价值是什么，作出了创新性的、有益的探讨。作者还探讨了历史哲学的一般史学方法论价值问题，这也是有新意的。通常我们都说历史

哲学是历史学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学，但缺乏专题性研究，到底历史哲学在历史研究中是如何发挥其导向作用的，并不是完全清楚。本书进行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提高，并为后面叙述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铺垫。

在第二部分，作者首先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为从本质上、方法上掌握唯物史观提供了前提。接下来，作者以马克思历史理论为基点，阐释了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原则和内涵。不难看出，作者在这一部分花的力气最大，可以说是用力颇深。作者将马克思历史理论方法化了。也就是说，作者在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从原理谈到原理，局限于概念的述说，而是通过分析马克思如何研究历史过程的思路和方法，揭示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本书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方法论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力图回答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历史认识论价值和史学方法论价值是什么？从书中来看，作者并非对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论作简单的、机械的归纳与分析，而是立足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思潮进行具体的剖析，从而提出作者独到的观点与认识。这无疑为推进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讨论基础。

在第三部分，作者回应了当代中国历史学理论思潮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我们不应回避思想的交锋，而是应当在积极的对话和交流中取得认识的进步。一方面作者认为，我们不应在广泛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过程中，轻视甚或抛弃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也应当在 30 年历史学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步的基础上，改变 20 世纪 50、60 年代一度简单地把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的、最终的理论的态度和做法，更加科学地阐释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许

多问题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种积极的探索精神，则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和史学发展对史学理论创新要求的回应。

诚如于沛先生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中所说，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要经历三条途径：一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遗产；二是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精华；三是加强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研究。强调和重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性作用，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讨论多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面，深入的专题性研究也有，如庞卓恒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于沛的《历史认识概论》等，但为数尚少。所以，当我看到作者的这部书稿后，感到他所做的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专题研究，对进一步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大有裨益，因此，非常高兴和荣幸地向大家作一些介绍和推荐。

本书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可能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重要的在于我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已行动起来。至于书中的优点与不足，相信读者更具慧眼，就留待读者去加以评说。

林文勋

二〇一〇年春节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历史哲学的演变与一般史学方法论 / 1

- 一、历史哲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属性及演进逻辑 / 5
- 二、部落共同体时期的原始历史哲学思维 / 22
- 三、宗族、贵族（教会）国家时期的历史哲学观念 / 28
- 四、民族国家时期的历史哲学体系 / 37
- 五、世界历史时期的历史哲学变革 / 51
- 六、全球化时期的历史哲学新形态 / 63
- 七、历史哲学的一般史学方法论 / 86

第二章 唯物史观理论结构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方法论阐释 / 109

- 一、唯物史观理论结构的方法论解析 / 109
- 二、唯物史观历史理论的两个基本思想 / 115
- 三、唯物史观历史理论的发展 / 120
- 四、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方法 / 125
- 五、马克思研究事物的历史起源及过程的方法 / 129
- 六、马克思研究西方历史进程的典型方法 / 134

2 || 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

七、马克思研究东方历史进程的典型方法 / 138

八、以发展的眼光理解三大形态论断 / 146

九、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方法 / 152

第三章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问题 / 159

一、唯物史观与西方文化传统 / 168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结合的路径 / 189

三、唯物史观概念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 / 195

四、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原则和范畴 / 206

五、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与实证主义史学 / 232

六、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
方法的运用 / 237

七、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与西方分析历史哲学、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 / 253

八、历史规律性认识的价值 / 263

后 记 / 279

第一章

历史哲学的演变与一般史学方法论

唯物史观是人类历史哲学认识史上一个重要的革命性阶段，它在总结以往历史哲学经验的基础上创立起来。要阐述清楚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认识史上的作用和方法论意义，有必要对历史上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特点进行叙述。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等，是历史哲学的同义词，本书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虽然马克思曾表示过反对将他的资本主义过渡理论作为抽象的历史哲学对待，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历史哲学。一个思想家称他自己的思想是什么，和他人认为他的思想是什么，往往是不同的，这在学术史上不乏其例。但谨慎一些的做法是，在什么意义上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要联系具体的语境进行表达。关于历史哲学，沃尔什将其分为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这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也有人主张历史哲学只有一种，包括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如庄国雄认为，“总起来说，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互需要、相互结合，并且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在这个前提下，就不再需要‘历史的哲学’和‘历史学的哲学’两个名称，就可以统一称之为‘历史哲学’”。^① 本书赞同这种观点，并

^① 庄国雄著：《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在这种观点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概念。

例如，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柯所写的《新科学》，是所谓思辨历史哲学的开山之作，但书中贯穿了大量如何认识历史方法的论述。该书的第一卷以“一些原则的奠定”为题，讲述如何认识历史的方法。依据历史演变的进程认识历史的性质，依据野蛮人认识历史的方式理解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依据社会制度的建立区分人类的野蛮和文明，依据归纳法总结人类历史的共性，等等，这些就是维柯在书中强调的历史认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诗性智慧概念的运用。维柯用诗性智慧这一概念，阐述了野蛮人认识历史的特点，为建立原始社会的历史认识论开辟了道路。费希为《新科学》的英译本所作的引论，大致论述了维柯历史认识论的特点。费希指出：“新科学是用再创建最初的科学来创建新科学本身”，^①“《新科学》像一切科学一样，必须从题材内容开始处开始。但是它的题材内容都是创立制度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和各种制度的最初起源同时开始的”。“诗性智慧的性质”，“是新科学的万能钥匙”。^②维柯历史哲学包含着的历史认识论，其分量并不少于专论历史进程的部分，而且就连书名也以谈研究方法为题。书名之所以叫“新科学”，意思就是书中讲述的是研究人类事务的新方法。

同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论述了历史认识论。他的《历史哲学》一开篇就讲到，“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③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历史认识具有三个层次。接着，黑格尔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前提假设问题，指出：“哲学的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

① [意] 维柯著：《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7 页。

② [意] 维柯著：《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4 页。

③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有价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的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① 历史学家“离不开他的范畴，而且从这些范畴来观察他心目中所见的各种现象”，“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② 黑格尔谈到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指出，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结合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普遍中包含着特殊，特殊中存在着普遍。他说：“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黑格尔进一步说，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将理论和实际等同起来，“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抽象的原则和它的具体的实现，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无限差别”。黑格尔还谈到了如何发现历史真理的问题，他认为真理产生于一般和个别的结合之中。他说：“普遍的、在本身为本身存在的东西一般地和那个别的、主观的存在的东西的结合——只有这个结合才是真理”。“一个普通的观念赋形于直接的现实，以及一种特殊性提高成为普遍的真理”是产生真理的途径。黑格尔也涉及到了历史叙述学，他说：“语言是理论的智力在一种特殊的意义里的行动，也就是它的外面的表现”。^③ “没有主观的历史叙述，没有纪年春秋，所以也就缺少客观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上述历

①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9 页。

②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③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 页。

史认识论的实践，他用理性范畴撰写了一部人类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中，也论述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如，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唯物史观是以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理论出发点的，辩证法为他们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他们历来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理论思维就不可能产生理论创新，而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实现民族的进步。他们认真研究过思维的形式问题，指出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就得服从思维的规定。^①思维的形式具有个别性认识、特殊性认识、普遍性认识几个阶段，等等。恩格斯专门就如何学习哲学的问题，悉心指导了普列汉诺夫，帮助他学习黑格尔哲学，为普列汉诺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哲学的演变史证明，如何去认识历史是在认识历史的实践中展开的，这往往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每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出现，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认识论作为支点。把历史哲学看成一种和把它分为思辨的和分析的两种，背后隐含的价值取向是，前者看重所谓思辨历史哲学的价值，后者看重所谓分析历史哲学的价值。我们认为，由于所谓思辨历史哲学直接去认识历史，其中还包含着历史认识论，它的价值比之专门谈论如何去认识历史的所谓分析历史哲学要大得多。分析历史哲学的价值仅在于，它把在思辨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系统化、专门化了。

历史哲学既是历史认识的理论总结，又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无一没有自己的历史哲学，流传于世的史学名著无一不是历史哲学的结晶。历史哲学在史学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历史哲学发展的过程如何，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些什么认识论特点和意义，

^① 恩格斯说：“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这些就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一、历史哲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属性及演进逻辑

历史哲学产生的主客观条件。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使历史哲学不断获得新的形式,这是历史哲学产生的客观前提条件之一。“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通过人的活动与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就逻辑地决定了自然史和社会史、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①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哲学认识,同人类对它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这诚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科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必然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人本身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广袤的大自然中的一个成员,自然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自然变化的认识,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活动,从而影响到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哲学思考。每一次重大的自然科学进步,都改变了人对自然的关系,使宇宙的本质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日益得到正确的对待,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修正,人们也就重新解释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构成,改变以往对人类自身活动的认识形式,这样遂使历史哲学脱掉陈旧的外套,获得与时代科学精神相符合的新形式。

例如原始人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哲学思维包含在“万物有灵论”中,那飘忽不定的灵魂的永恒存在,被用来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本质的一种说明。之所以如此,与原始人把自然亦看成有灵魂存在于其中的思维有关。“物我不分”是原始人认识自然与人

^① 符兴著:《历史观也要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哲学动态》1983年第8期。

类世界的显著特点。出于生活完全绝对地依赖于自然的现实，原始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是，把人融入自然的无限之中，化为一种跟其他物类没有什么两样的物种，以一种自然本性的心态来对待自然。原始人对自然的变化既恐惧又崇拜，这种心理反映在对人的活动的反思上，同样表现为对人的活动也是既恐惧又崇拜的两重性。由于对自然和人类世界都存在把握不住但又想努力去把握的矛盾心态，而且幻想着超越这种矛盾获得对它们的彻底了解，于是原始人就用了自己时时面对的、最熟悉的，但同样是一种想把握而把握不住的东西，即心灵来作为认识自然和人类世界的依据。有如梦幻般不易捉摸的灵魂就成为对人的活动的最终解释之根据了。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人们对人的活动的最终解释有循环史观、天命史观、神意史观等，之所以采取这些形式，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认识分不开。作为物质资料基本能满足温饱的现实的反映，当时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是：自然的造化恩赐了人间的一切，自然的运行维持着人间生活的常态。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虽然还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对自然的相依相伴的友好之情，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形式。古代的文人骚客面对自然吟唱出的无数瑰丽佳作就是这种认识的生动写照。如诗仙李白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依赖自然而生存的心理反映在人对自身活动的反思上，就表现为，人的命运也一定是依赖于人之外的非人间力量的。所谓天命、上帝不过是神化了的不可知的社会力量的命名，正如自然的力量是不被深知的一样，它也是深不可测的。

而在工业文明勃兴之际，由于天文学、力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自然界的奥秘被揭开了，当时人们认识到，只要掌握了自然规律，人类就一定能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成为驾驭自然物质的主人。英国诗人波普为牛顿写的两行墓志铭诗就表达了

这种心态，他说：“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神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同样影响到人对自身活动的认识。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就像万物具有自己的规律一样，人类的活动也有自己的规律，如果像掌握自然规律那样掌握了社会历史规律，人类就能像控制自然力那样控制社会力量，让社会规律为人类生活服务。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维柯、赫尔德、黑格尔、圣西门、傅立叶以及后来者都鲜明地表示，他们的历史哲学，是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己任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对 19 世纪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其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思维方法的基础。

20 世纪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量子力学、相对论、生态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人们从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概括人类历史进程。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使人类历史具有方向性的动力机制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可逆趋势，从而使历史的发展具有了普遍性。如福山曾说：“倘若我们仔细观察所有人类社会行为，唯一被明确公认为积累的并且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就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① 另外，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在改变 19 世纪的自然观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规律观。不确定性、或然性、概率性等思维形式被引入到历史规律概念中。总之，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想首先突破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形成新的思维方式，转而又影响到人对自身活动关系的认识，启发着人们观察问题的思维和方式，这就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制约着历史哲学认识形式的过程 and 表现。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1 页。